

2 2

一年前的雙月刊2月號，我們刊登了王中江的〈從《觀察》看中國自由主義認同及其困境〉。該文引發傅玄的興趣，為此撰文回顧《觀察》在1948年被查封之後一年的復刊情況及變化，繼續探討當時的自由主義份子之所以「歸於沉寂」的原因。配合反思近代知識份子的關懷與處境這一主題，我們並刊登了文暉回顧40年代出現，名為「戰國策派」的文化群體的論文。作者指出，「戰國策派」雖然受到極大非議，但也可以從理論中發現他們對民族發展的承擔與經世理想。並且，畢新偉也在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欄目撰文，分析《大公報》在英斂之執掌時期所鼓吹的女權思想。

張百慶在華北一個鄉村進行田野調查，探討「為人」與「懂事」這兩個人際交往的概念所反映的鄉村秩序，進而剖析中國法治的民間資源之可能及其限制；崔效輝撰文回顧參與式發展在近代中國的實施，尤其是在20、30年代，分別由梁漱溟及晏陽初領導的「農村建設運動」的兩大流派。兩篇文章都收錄在「政治與法律」欄目之中。

此外，今期的「人文天地」刊登了竇康分析30年代文學界出現的「第三種人」論爭；「經濟、社會與傳媒」則載有凌燕對電視體制改革的分析，探討電視媒體在政治控制與尋求利潤兩股力量之間的發展生態。